目　　录

前　言

“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特色……林树建（ 1 ）
上海的“宁波帮”……陈立攸（ 24 ）
宁波旅沪同乡会……董启俊（ 40 ）
在天津的“宁波帮”……张章翔（ 51 ）

为“宁波帮”开路的严信厚……沈雨梧（ 65 ）
“五金大王”叶澄衷……朱文炜（ 72 ）
叶澄衷及其办学事迹……周克任（ 77 ）
朱葆三的一生……陆志濂（ 80 ）
汉口头号商人宋炜臣简历……武　志（ 94 ）

镇海柏墅方氏家族史……汪仁泽（ 95 ）
两度主持上海总商会的方椒伯 ……（ 103 ）
中国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 ……（ 109 ）
镇海小港李氏家族史略……王遂今（ 123 ）

“企业大王”刘鸿生……陆志濂（ 132 ）
颜料买办周宗良……卢书镐（ 157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长袖善舞的黄楚九……谈玉林(166)

抗日殉身的爱国企业家项松茂……汪仁泽(177)
赵家蕃、赵家艺兄弟……陈觉民(192)
大中华橡胶厂创办人余芝卿……汪仁泽(195)
三友实业社与陈万运、沈九成……陆志濂　陈立仪(201)
中国国货公司与李康年……沈雨梧(212)
创办民丰、华丰造纸厂的竺梅先……竺培农　竺培德(217)
重振民丰、华丰造纸厂的金润庠……金志朋(231)
俞佐庭——从宁波商会会长到上海市总商会主委…宋紫云(239)
俞佐宸小传……陈惠炳(247)
黄延芳——热心救济事业的爱国实业家……汪仁泽(249)
致力民主运动的盛丕华……汪仁泽(256)

“宁波帮”是在什么条件下崛起的……王遂今(266)

小资料

孙中山论宁波和宁波人(39)　美领事眼中的宁波轧花厂(50)　**“宁波帮”机器工人和木工(131)**　**“宁波帮”中的银行家(246)**

“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特色

林树建

所谓商帮，是以乡谊为纽带连结而成的组织松散的地方性商人集团。“宁波商帮”，是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在外地所形成的商人集团。本文拟就“宁波商帮”的形成环境和形成过程，活动地域和经营行业，特色及其与“徽州商帮”的异同等问题，作一综述和分析。

一、“宁波商帮”的形成环境和形成过程

（一）地理环境　宁波从事经商活动，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它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府志》称：“宁郡六县，俱皆滨海”，“西南自岭粤，东北达辽左，延袤一万四千余里，商船番舶，乘潮出没”，“内则联络众省，外则控制东倭”，“有鱼盐市舶之利，实东南之要会也”。由于“宁波地处海滨，居南北洋中间，过去南北洋往返的船只，往往以宁波为停泊站，并以其所运载的南北各地物产与宁波土特产交换，这样就导致了宁波、慈溪、镇海一带商人创设南号与北号，自行置船装运”①，形成南北号行业。特别是宁波与上海一苇可航，宁波商人

鹜趋上海，故宁波商帮在沪势力特盛。

宁波不仅海道辐辏，而且河道和陆路交通也很方便。唐宋时期，通过甬江、姚江和浙东运河，渡越钱塘江，与大运河沟通，可货运全国各地。至于近代沪杭甬铁路建成后，与各地联系就更见便捷了。

（二）历史环境　宁波秦时称鄞，早在秦代以前已有近海岛屿上的渔贩盐商和滨海地区的商贩来这里集货贸易。《乾道四明图经》曾载："鄞山……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县居鄞山之阴加邑为鄞"。晋时"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宋市舶，遥达海外"②。宁波一直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陈裕菁译订的日人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说：唐代"福州、明州（即今宁波）、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皆贸易港也"③。又据日人木宫彦泰说：唐时，泛海兴贩的中国商人"南路照例从明州出发（即从福州或台州开出的船，一般也先到明州停泊），横渡东中国海，到达值嘉岛，从此再进入博多津。"大商人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都自备船舶，往返于日本与浙江明州、台州、温州诸港④。宋代，开赴日本、高丽的商船也大都在明州放洋。《扶桑略记》载，白河天皇承历四年(1080年)闰八月，宋商孙忠曾带明州牒文，进入越前敦贺港⑤。去高丽经商的明州商人，有名可考的，如宝元元年（1038年）有陈亮等147人；崇宁二年（1103年）又有杜道济、祝延祚等到高丽经商，并留居高丽⑥。元代，庆元（即今宁波）古江厦码头改称下番滩码头，"番货海错，俱聚于此"。定海（即今镇海）也系"蛮夷诸番舟帆所通，为一据会总隘之地"⑦。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政府厉行海禁，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而走私贸易异常活跃。嘉靖年间，通番者已"不可数计"，甚至"极远之物，皆能通之"⑧。"鄞县人毛海峰、徐碧溪、徐光亮、叶宗满等"，经常"装载硝黄、丝绵等违禁诸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互市"⑨。日人中村新太

郎说：明代日本对华贸易，“在特许贸易之外，商人们私下贸易也很盛行。主要的途径是在宁波通过明朝人做为揽客来进行交易”⑩。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三十四年“分设浙海关署于宁波、定海”⑪。荷兰、英吉利等西欧商船鹜趋定海，云集宁波。夏燮《中西纪事》曾载：英商在“台湾隶入大清版图”后，“时来往于浙之舟山、宁波等处”。《皇朝文献通考》也载：“外洋红毛诸国番船”，“至宁波者甚多”。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一年之内，来定海的英国商船就达10艘⑫。这正是《南京条约》英国侵略者要求辟宁波为通商口岸和鸦片战争后不少宁波商人充当洋行买办揽客的原因之一，也是构成宁波商帮特色的重要历史因素。

宁波是滨海港口城市，因而古代宁波商人主要从事海外贸易。但在国内各地经商的也非少数。这里举几个古代著名的大商人：

宋代的张云衢，“起家货殖，结约徽商，同客维扬，遂以资雄一乡，称封君焉”⑬。

元代的倪溁也是一个能左右米市的巨商。《鄞县志》载：“倪溁使人贾泉州，得米盈巨舰，米商随而至者六十余艘，价腾踊，溁故损其价，群商恨之”。

特别是明朝厉行海禁，在日趋繁荣的商品经济的驱使下，商业资本为了寻求出路，宁波商人除了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贸易外，纷纷转向内地贸易，这时在内地经商的宁波人渐多。如明代万历年间开设的孙春阳南货铺，是苏州数百年老店，这家“天下闻名”的南货店，就是宁波人经营的。清钱泳《履园丛话》载：“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案春阳，宁波人，明万历中，……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总管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其店规之严，选料之精，合郡无有也。”

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宁绍盛科名逢掖，其咸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广志绎》成书于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可见明万历前宁波人外出经商者已为数不少，明末宁波商帮的崛起并非偶然。

（三）形成过程 （1）初始形成阶段 如前所述，宁波人外出经商古已有之。而结成商帮，则是明代末年的事。其形成的标志是天启、崇祯年间，宁波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

北京右安门内郭家井二号四明会馆，有旅京宁波同乡公益会于民国13年（1924年）所立的《四明会馆碑记》，碑文中称：鄞县会馆，“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⑭。会馆系同乡组织，其宗旨为“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⑮。从四明会馆碑记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鄞县会馆属于以商人为主的同乡会馆。民国11年（1922年）鄞县会馆改名四明会馆，成为旧宁波府属各县旅京者同乡会馆。举行四明会馆落成礼时，宁波“同乡之旅京者多与焉，而以执工商业者为尤众”⑯。明末宁波帮商人在外地经营活动还是零星分散的，作为在京宁波帮商人活动场所的鄞县会馆，主要是“建置义园”，“妥厥旅魂”，举办公益事业，起“敦桑梓之谊”的同乡联谊作用⑰。

稍晚于鄞县会馆的，还有座落在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129号的“浙慈会馆”。“浙江慈溪县成衣行商人会馆，又名浙慈馆，约在清初成立，光绪十六年重修”⑱。光绪三十一年所立的财神庙《成衣行碑》记述：“经前成衣行会首，在于京师城内外，商同各铺掌柜、伙友出资，在于南大市路南创造浙慈馆。……当时成衣行，皆系浙江慈溪县人氏，来京贸易，教道（导）各省徒弟，故名曰

浙慈馆，专归成衣行祀神会馆”。以碑文看，当时的浙慈会馆属于主要事务由工商业者掌握的商人会馆。

这一时期，即明末清初为宁波商帮初始形成阶段，其主要活动地域在北京，主要经营行业是药材业和成衣行。从“会馆之设，肇于京师”⑲和清初宁波籍大理卿陈心斋修葺整理鄞县会馆⑳这两件事情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商帮依附于封建官僚的关系。

（2）迅速发展阶段　清乾隆、嘉庆时期，商品货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商业资本益形活跃，这是宁波商帮迅速发展阶段。这时宁波商帮不仅在北京的势力有所加强，还在常熟、汉口、上海等商业重镇创建会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宁波商人在常熟创设宁绍会馆。《常熟宁绍会馆始末记》载：“迄清乾隆辛卯，始由叶公林春酿资置地为义瘞所”㉑。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宁波商人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建立浙宁公所。《夏口县志》载：宁波会馆在九如桥，清乾隆庚子成立，联络同乡，维持商业。旧名浙宁公所，清宣统元年改今名。嘉庆二年(1797年)，上海四明公所建立，为“四明同乡之从宦服贾者捐资置地”所建㉒。《上海县续志》载：“四明公所，在二十五保四图，嘉庆二年宁波费元圭、潘凤占、王秉刚等创募”。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宁波在关外、山东等地贸易之众商集资在上海创建浙宁会馆㉓。《上海县续志》载：“浙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在荷花池头。嘉庆二十四年甬商董萃记等创建”。这个时期宁波商帮所建的会馆公所，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研究商务，团结同乡，以维护共同利益。诚如《鄞县通志》所说：“我国民众之有团体，盖滥觞于商贾。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伎羊自周已然，而同行嫉妒一语亦已为方俗口头禅。于是其中有翘楚者出，知互相倾轧必致两败俱伤也，乃邀集同业订立行规，相约遵守，俾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此商业团体之成立所以为最古也。其资力较雄

厚者或建造会馆或设立公所，以为同业集议联欢之所，公举董事柱首等掌理评议经济诸务。”这段议论，基本上可以说明当时会馆的性质和作用。

（3）趋于成熟阶段　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宁波于1844年辟为通商口岸，英、法、美等国相继派驻领事或副领事，并划甬江北岸作为外人居留地，设立洋行。这时，宁波商人擅长对外贸易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出现买办商人，宁波商帮迅速崛起，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鄞县通志》称：“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这个时期是宁波商帮趋于成熟阶段。

其时，宁波商帮活跃在全国各地，尤其在上海，宁波人“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㉔。董启俊说：“上海居民中，宁波人占相当大的比数，在清末估计已达40万人”㉕。宁波商帮在上海商界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㉖。这时宁波商人在上海按行业分帮，分别建立各业各帮会馆。如余姚陈淦，慈溪罗秉衡、袁鎏，鄞县李汉绥等创建上海北市钱业会馆㉗；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上海营业的宁波肉业帮创立诚仁堂㉘；光绪十八年（1892年）宁郡六邑竹业帮创立同新会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宁郡六邑马车漆业帮创立同议胜会㉚；重修上海轩辕殿助捐各户中有宁波六邑的洋广帮、洋行帮、零剪业、兜套业和衣庄店伙。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明公所“复于日晖港购地三十亩有奇”，广构屋宇，筑建办事室。“甬人之旅沪者最众，各业各帮大率有会，而皆总汇于公所”㉛。

宁波商帮在北京、天津、汉口、苏州等地的势力也有进一步发展。

近代“北京的工商业，几乎完全掌握在地方行帮商人手里。如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都是清一色的浙东商人”㉜。由原籍宁波府慈水镇的乐氏于清康熙年间（1702年）创办的同仁堂药

铺，这时又有新的发展（乐家第十代乐平泉重振同仁堂，其孙乐达仁开设达仁堂）。北京浙慈会馆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重修时“共用银一千九百五十二两三钱二分”，首事人有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七十三人㉝。

近代天津“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止”㉞。宁波商人经营的大型帆船（俗称北头船）行驶于宁波、上海、天津间，每艘船载重量约有七、八十吨之谱，除为清廷漕运粮食外，还兼营南北货运生意。天津漕运局总办张友堂是宁波人，曾给同乡很多方便。北头船在天津闸口建有商船公所，专供北头船到达天津后集会之用，亦为宁波同乡联络之所㉟。宁波帮和广东帮还是最早进入天津法租界设店经商的中国人。早期在法租界有名的宁波帮商店有冠生园南味店、李同益西服店（另一说是李同益呢绒店）等㊱。这时在天津的宁波商人已为数不少，除贩运南北货物的北号庄客童承初外，宁波商帮头面人物如严筱舫（即严信厚）、叶澄衷、严蕙铭、王铭槐、叶星海等都活跃在天津商界。（编者按：关于他们的活动事迹，参阅本书《在天津的“宁波帮”》一文。）光绪年间，严筱舫、严蕙铭、王铭槐等发起将天津北门里户部街浙江乡贤祠扩充为浙江会馆。“由于宁波同乡占人数最多，所以会务领导权始终为宁波帮所掌握”㊲。

近代汉口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宁波人在汉口经商亦为数不少。作为宁波商帮在汉口的重要活动场所的浙宁公所，宣统元年（1909年）重加修葺，改名宁波会馆㊳。

光绪年间，宁波帮商人在苏州南濠大街147号也建有浙宁会馆。

这时，宁波商帮的活动范围还不只限于各大城市和商埠，在市镇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如设在南浔镇北下坝的宁绍会馆，系嘉庆中建，同治五年、光绪十六年重建㊴。

（4）臻于鼎盛阶段　民国时期，是宁波商帮臻于鼎盛阶段。

孙中山先生对宁波商人备加赞赏，曾说："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49]。《慈溪县志》也载，甬人"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东西南洋诸国亦揩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这时，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已经长成，他们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熏陶，不少人出身于洋行买办或充当过买办，对新事物极为敏感，具有西方经商手腕。由于这批商人活跃于商界，使帮口商人的势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宁波商帮和上海商帮替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执全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

其时，宁波商帮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大商埠势力特盛。

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而20世纪前半期的上海总商会基本上就是由甬籍商人组成和主持的。

汉口商界巨子也有不少是宁波商人。如在汉口商务总会中，鄞县人卢鸿沧曾任首届总理，第二、四届议董，第七、八届特别会董；蔡永基，曾任第二届议董；蔡瑞卿，曾任第九届评议会董；以上诸人都是鄞县人。汪炳生，曾任第二届协理，第三、四、五届议董；盛竹书（炳纪），曾任第五、六届协理；宋渭润（炜臣），曾任第一、四、五、六届议董，第七届会董；史晋生，曾任第二、三、四、六届议董，第七、八届会董；第九届特别会董；郑似松，曾任第二、三、四、五、六届议董，第七届会董，第九届副会长；沈宾笙，曾任第四届议董；王柏年，曾任第六届议董，第七、八届会董；以上诸人都是镇海人。秦楔卿，曾任第九届会计会董；赵典之和郑燮卿，曾任第九届庶务会董，他们都是慈溪人。

在天津商界势力最大的是广东商帮和宁波商帮。民国时期，

在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宁波帮商人经营的[41]。

二、“宁波商帮”的活动地域和经营行业

（一）宁波商帮的活动地域 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乡会情况看，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地域有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吴县（苏州）、常熟、临海、兰溪、严州（建德）、温州、长兴、无锡、盛泽、扬州、徐州、怀宁、芜湖、南昌、江陵（沙市）、应城、长沙、巴县（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等地。天津虽然没有宁波同乡会，也是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地域。此外，一些偏僻城镇也有宁波商人，如安徽庐江“凡食用之物，多山、陕、徽、宁人开设铺户”[42]。

宁波商帮的活动地域还不限于国内，在海外也分布甚广。宁波人有两次移居海外的高潮。《定海县志》说：“饥驱寒袭，迫而之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光宣以来，商于外者尤众，迩年侨外人数，几达十万”[43]。这是第一次移居海外的高潮。另一次是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大批工商业实业家从上海移居港澳，或以台湾为跳板，转向南北美洲、大洋洲和西欧。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3万多人，遍布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西德、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居海外的宁波人中不少是工商业巨子。

（二）宁波商帮的经营行业 宁波商帮的经营行业，从甬商在沪、汉、津等大商埠的经营情况，可窥其大概。

（1）上海 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地域在上海，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4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宁波商帮在上海主要经营行业有：沙船业以及后来的轮船业，钱庄业以及后来的银行业；工业方面，有火柴、煤矿、造纸、化工、制药、纺织、毛纺、橡胶、制钟等；商业方面，有五金、颜料、煤炭、水产、食糖、银楼、绸布服装以及保险、证券交易所等。（编者按：以下从略，详情参阅本书《上海的“宁波帮”》等文。）

（2）汉口　在汉口的宁波商帮，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航运业、火柴业、水电业、杂粮行、洋油行、五金行、银行业等行业，并有不少商人充任洋行买办。《夏口县志》载：“宁波帮，……或合绍兴称宁绍帮。凡汉口之海产物商店及金银细工业，大半为此帮所占。又长江之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其输入品为棉纱、棉布、绸缎、海产物等类，输出品为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苎麻、棉、米等类，年贸易额约三千五六百万至四千万两（系1918年贸易额——引者注）”。该志还记载：宋润润（炜臣），浙江镇海人，为汉口水电公司总经理（他以火柴业崛起于汉口，拥有汉口燮昌火柴厂和汉口既济水电公司）；郑似松，浙江镇海人，为汉口太和杂粮行经理；汪炳生，浙江镇海人，为汉口太记洋油行行东；史晋生，浙江镇海人，为汉口顺记洋油号经理；沈宾笙，浙江镇海人，为汉口顺记五金号经理；卢鸿沧，浙江鄞县人，为汉口交通银行经理；盛竹书，浙江镇海人，为驻汉浙江兴业银行经理；蔡永基，浙江鄞县人，为汉口华昌洋行经理；王柏年，浙江镇海人，为汉口美最时洋行经理。汉口很多“生意人”都来自宁波。在“招徕货运，出售洋货等方面，宁波人买办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汉口的琼记洋行以宁波买办“最能满足行务的需要”，同宁波买办“特别容易作成碴、烟草等商品的生意”[45]。《定海县志》亦载，定海“侨商以上海、汉口二处为最多，当不下二万人。”并载，“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按：即‘买办’一词的英语译音）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经理煤

油亦邑人特擅之业也，美孚、亚细亚二大公司其各埠分销处凡十之六七由邑人承办”。

（3）天津　在天津的宁波商帮，主要经营航运业、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首饰业、钟表眼镜业（编者按：以下从略，请参阅本书《在天津的“宁波帮”》一文）。

（4）其他　宁波商帮的经营行业，除了上面提到的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大商埠所经营的以外，还有药材业和民信局等行业，值得一书。

药材业。宁波商帮经营药材业，活动地域极广。《慈溪县志》载：“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宁波的药材运销全国各地，运贩药材的商人，以慈溪帮居多。据说慈溪人冯阿荣开设的“冯万丰”药号，因资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有“功”，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并取得免税贩运的特权，业务大振。慈溪药材商人也有冒“冯万丰”牌号运销的，从而宁波帮商人在各地经营药业的甚多[46]。除前面说过的北京外，绍兴的国药名店震元堂是慈溪人杜景润于清乾隆年间开设的[47]，温州的国药名店叶同仁是慈溪人叶心培于清康熙年间开设的[48]，上海的四大国药店的经营者也是清一色的宁波人[49]。

民信局。宁波商帮经营的民信局活动地域也很广。据《鄞县通志》记载，民信局为“甬人首创”，其创始年代“约在明代永乐以后”，而以“清代道光、咸丰、同治以迄光绪初年为最盛”，后因设立邮政局而渐次衰落。该志还说，民信局“初仅沿海各省有之，后渐及于内地，远届东三省及陕甘新疆。当其最盛时，全国大小信局无虑数千家，其营业范围除国内各都会市镇外，且远及于南洋群岛。而吾甬商帮实执其牛耳。自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商业日趋发达，各帮竞设总局于上海，甬帮本其敏锐之目光，应商业之需要，扩大其组织，遍设分局及代办处于各埠，星罗棋布，互相联络，各地商民无不称便。其他各帮虽亦发达，然终不

速甬帮之盛。故当时有信局为宁波人独占之语，亦可见甬帮势力之雄厚矣。[10]

三、宁波商帮的特色及其与徽州商帮的比较

作为一个商帮，其崛起和兴盛都有某些共同性。由于各个商帮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差异，又有各自的独特性。宁波商帮与徽州商帮是江南两大商帮。徽州商帮是指徽州府所属歙县、黟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六县在外地的商人集团。明代万历年间的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即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11]徽州商帮崛起于明代中叶，清代康乾年间臻于鼎盛，道光以后渐次衰落。通过对这两个商帮的比较分析，可以探究鸦片战争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何以宁波商帮能后来居上，而曾称雄商界、显赫一时的徽州商帮却一蹶不振的原因，从而加深对宁波商帮特色的认识。

宁波商帮具有以下五个特色：

（一）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 "甬俗民情朴厚，素敦恤睦之谊"。宁波商人重乡谊，凝聚力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例如，由宁波商人集资兴办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于1908年在上海开业后，曾受到外国银行和洋行的倾轧，一遇风潮，便拿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来挤兑现洋。四明银行实力并不雄厚，而在挤兑风潮中能多次化险为夷，其原因就在于宁波同乡的团结互助之力，宁波人开设的各大商店、钱庄、银号，往往在挤兑风潮来袭时，家家代为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使风潮得以平息[12]。《上海县志》说：四明银行"兑现、提存，赖以平定者，俱甬商之力"[13]。再如，1909年宁绍帮商人合资创办宁绍轮船公司，以与英商

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五角”，以示永不涨价。这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船。太古轮自恃资本雄厚，把票价从一元降到三角，以图压垮宁绍轮。赖宁波同乡（当然主要是商人）齐心支援，组织“航业维持会”，每票补贴宁绍公司二角，使其在与外轮竞争中终于获胜。为此，航业维持会一共贴出了十万余元[9]。这种同乡扶助观念，可以说是宁波商帮的基本特色。《鄞县通志》说：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这使宁波商帮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得以立足和发展。

诚然，作为商帮，内部都有“有利均沾，有害共御”的互助精神，这是商帮的共同性，徽州商帮亦然。徽商往往举族经商，以宗族近亲为骨干，世代相传，形成宗族性商业集团，如《歙县志·风土》所载的“江村之江（姓，下同——编者注），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都是商业资本与宗法制家族经济相结合的商人世家。徽商甚至还有异姓合本经商的，结伙的商人“歃血为盟”，犹如结义兄弟，他们资本雄厚，竞争力强。而宁波商帮的同乡扶助观念，比徽州商帮的这种宗族内部互助和同伙内部互助似更进了一层。

（二）富有开拓冒险精神 从商帮的活动地域看，宁波和徽州都地狭民稠，他们不愿株守本乡，因而四出经商，活动地域都很广。《鄞县通志》说：甬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歙事闲谭》也说：“郡邑（歙县）田少民稠，商贾四出，滇、黔、闽、粤、豫、晋、燕、秦，贸迁无弗至焉，淮、浙、楚、汉其迹焉者矣。”然而，从有关史料看，宁波商帮勇于开拓新的活动地域。《定海县志》说，“冒险之性”为“岛民所特具”，“航海梯山，视若户庭”。相对来说，徽州商帮就较保守，虽然他们也“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10]，但辛

亥革命后，徽州商帮在各地，特别在各通商口岸的势力远不如宁波商帮。上海是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地域，甬商盛于徽商自不待言。在汉口，徽商曾于清康熙七年建新安公所，以“力谋桑梓商业公益”[56]，可是到民国七年，其在汉口的贸易额却十分有限。《夏口县志》载：“徽州帮包括太平帮为安徽全省之代表。以典商及棉纱商为最盛，次之则茶业、钱业、油业及笔墨商等，年贸易额约六、七百万两。”其时，宁波商帮在汉口的“年贸易额约三千五、六百万两至四千万两”，两者相差甚远。

从经营行业，也可以看出宁波商帮的开拓冒险精神。他们经营的往往是新兴行业。如甬商中不少人从事进出口贸易，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西药等畅销洋货。欧美轮船侵入我国后，沙船业衰落，甬商便转而经营轮船业。十九世纪末经营钱庄的甬商意识到钱庄不久将被银行所淘汰，便设法插足银行。我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严信厚就自愿要求将所设的银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此事虽未成，严信厚、朱葆三等甬籍钱业巨子仍掌握该行实权[57]。徽州商帮这方面的开拓精神和应变能力就比较差。陈去病《五石脂》说：“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徽州商帮主要经营盐业。徽人业儒者、经商者都多，朝廷中达官显宦不少是徽州人。万历末年推行纲运制，徽商在缙绅势力的庇护下，攫取包销专利，得以发迹。清嘉庆以后，清廷内徽州缙绅势力渐趋式微，对朝廷机要政务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道光十二年（1832年）陶澍将淮北的纲运制改为票盐法，道光三十年淮南也改为票盐法，使徽州“盐商一败涂地”。对徽商来说，这是致命的一击。继后，徽州典当商因“左宗棠增质铺”而“几败”，茶商也“连岁之亏耗者不可胜数”。又逢“曾国藩驻师祁门，纵兵大掠，而全郡窖藏一空”[58]，积蓄的商业资本蒙受重大损失。至此，徽商连遭挫败，元气大伤，又不善于顺应时代潮流，改弦更张，经营新兴行业，终于渐趋衰落。

宁波商帮的开拓冒险精神，从商业资本的出路也可以看出。《鄞县通志》说，“甬人具有冒险性，都习海善航，以是与西人接触较早”，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影响亦深，所以“甬人以商著称，国中凡新旧企业，凡莫不占相当之地位。”甬商大都是具有西方经营思想的商业资本家，不同于“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旧式商人，也不同于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徽商。宁波商人也有致富后购置土地的。如光绪年间镇海李姓，其父“贸迁致高赀为富室”，他曾代父买好田二千亩[59]。但大量的是投资于新式工商企业。如镇海人宋炜臣经商致富后，在上海创设燮昌火柴第一厂，又在汉口设立燮昌火柴第二厂，后又在上海、汉口创办燮昌硝碱制造厂。再如，鄞县人项松茂，1911年任上海五洲药房总经理；1920年购进德商固本肥皂厂，将五洲药房改名为五洲固本药皂厂；1922年购进德商耐尔生氏所办的亚林制药厂；1925年购进中华兴记香药厂、南洋木塞厂，作为五洲药皂厂的附属厂；1929年购进宁波公济药棉绷布厂，改名为东吴药棉绷布厂；后又投资于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开成造酸公司、南洋烛皂厂、温州森林农林场、上海新亚药厂等十三个企业等等。宁波商帮中象这种以商业利润投资于产业，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缕举，他们很少有坐收地租或高利贷以求保险的那种守旧思想。宁波商帮这一特色与徽州商帮也有所不同。虽然徽商已开始较大程度地摆脱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传统的商业资本与土地相结合的状况（嘉靖《徽州府志》说，“商贾虽有余资，多不置田业”），明清时期的徽商也有投资于产业的，如汪道昆在《太函集》中曾记述朱云治、郑天镇、阮弼等人从事铁冶业、浆染业经营的情况。但是，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这种情况毕竟属少数，大量的商业资本却转向了高利贷资本。《休宁县志》说：“商贾之最大者举嵯，次则权母子轻重而修息之”。焦袁熹《此木轩杂著》也说：“徽人所为货殖者，典铺也”。典当是前资本主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